

# 再议“生生不息”是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

谢光前

(江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潮起涌动, 运河在二千五百年间对中国历史变迁的深刻影响被广泛认知, 其所承载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被普通认同, 由此凝练运河文化在漫长的时间之流和宏大的空间系列中所积淀的精神特质, 就成为时代之必需。华夏五千年文明, 运河二千五百年历史, 虽然在漫长的历程中出现过曲折、困迫、艰难、坎坷, 但迄今仍挺立于东方, 文明形态依然熠熠生辉, 在面向未来的征程中活力四射, 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大运河承载着古代中国连接政治与经济两个中心的重任, 几经淤塞却能够不屈再生, 不仅成就了唐宋元明清几代盛世的辉煌, 而且繁衍和滋润了无数可以引以为傲的文化瑰宝。生生不息的精神蕴含着道法自然的智慧、百折不挠的斗志、创新包容的气度和汇通天下的理想。在当代, 作为世界遗产、人类文明标志的大运河依然金帆犹在, 川流不息!“千年运河”将为民生福祉、文化自信、国家兴盛贡献新生力量。

**[关键词]** 生生不息; 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文化自信; 根本精神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4-0010-08

## 一、引 论

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期间, 基于对大运河历史变迁过程所聚集的文化特质的理解, 笔者曾以“言省”为名撰写文章认为“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sup>[1]</sup>。彼时, 关于运河精神之说曾引发不少异议, 有批评者认为运河不过是一条航运之道, 是物之载体, “精神”之说何从谈起? 时至今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潮起涌动, 运河在二千五百年间对中国历史变迁的深刻影响被广泛认知, 其所承载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被普通认同, 由此凝练运河文化在漫长的时间之流和宏大的空间系列中所积淀的精神特质, 就成为时代之必需。因为在新时代, 流动的运河在实用意义上的作用虽然依旧存在, 但在时空更替变化中, 从文化层面探寻运河存在的价值底蕴和精神内涵更具现实性, 这是理解运河之所以得以一脉长流至今且仍能闪烁其光华的要义所在。运河作为宝贵的世界遗产所蕴含的丰沛的文化资源可以构建起超越时空的精神家园, 进而浓缩为象征中华文明世代延续的精神内核, 以展现提振民族文

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当下,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日渐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家文化战略, 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流动的运河文化过程中, 对运河文化精神的概括和阐释不乏新作, 有认为“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up>[2]</sup>, 有认为运河“慈母养育、恩泽沿岸, 沟通天下, 奉献牺牲, 开拓进取, 多元开放”是其精神品格<sup>[3]</sup>, 但笔者认为, 精神意义的凝练与表达需要契合运河和中华民族具有的共同特质, 华夏五千年文明, 运河二千五百年历史, 虽然在漫长的历程中出现过曲折、困迫、艰难、坎坷, 但迄今仍挺立于东方, 文明形态依然熠熠生辉, 在面向未来的征程中活力四射, 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笔者在《“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一文中基于运河的变迁阐述了运河在通变中对沿线的经济文化的生成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而今看来, 文章尚有更系统阐释和充分发挥的必要, 故撰此文, 再议“生生不息”是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 求教方家。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大运河精神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18WTD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光前(1963—), 男, 江西信丰人, 编审,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与运河文化研究。

## 二、运河在古代中国 时空转换中之“生生”

运河文化的研究存在着多元视角,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都可以切入其中找到生长点。不过,追根溯源应当是不可忽视的,探究运河之“生”为何?且又如何而“生”?这乃始点。揭开人类文明的变迁史,众所周知,生存之需首当其冲,若生存难以为继,奢望其他乃是空想,生生之为大德。因此,无庸讳言,运河之“生”乃为人而生,它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能意识到用水改变生存状态从而满足自身生活与栖居需要的产物。在华夏文明中,有文字记载且有确切年号记录的运河是夫差开凿的邗沟,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在其他地域不存在人工沟通河道的可能,毕竟文献记载与运河开挖不会是同步的。当然,在几千年之后若欲通过考古发现人工河道也并非易事,因为在自然变迁过程的水道改变、泥沙淤塞以及人力所为皆可能毁损人工河道存在的证据。其实,自然河道也常出现类似的现象,诸如巴比伦文明之源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便已难觅踪迹,但这并不影响到它们存在的事实。在邗沟开凿之前,诸如禹“尽力乎沟洫”、泰伯开渚、胥溪贯通等记载都说明人试图改变自然水系以利自身的生存,拓展生命延展的空间。所以,比较运河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非得分出谁为“第一运河”,其实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如何理解运河是为人之“生”而“生”的,也就是说,应当明确它的出现是为满足人的生命存在而开凿的。治水理水是早期先民劳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语》说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反映了先人在处理人与水之间关系的努力作为。

当然,真正意义上规模宏大的运河的产生有赖于生产工具的进步。春秋时期,铁器制造和冶炼技术日臻成熟,铁制工具开始广泛应用于民众生活和劳作,因此,挖掘沟通不同水系之间的运河成为可能,如邗沟、菏水、鸿沟、灵渠等规模较大的具有运河形态的人工河渠出现也就顺理成章。

由运河的演进可以看出,运河的每一次重大工程的启动皆与“生生”相关。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崩乐坏,战火纷飞,群雄逐鹿中原。各诸侯国都在这纷乱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谋求生存,试图在争霸过程谋取有利地位。就以夫差开邗沟为例,在肉弱强食、相互倾轧的时代,地处南方被称为“荆蛮”的吴国四面受敌,楚国、越国、齐国、晋国等国对其虎视眈眈。国家此时若不图谋奋发自强,必将随时遭受他国的欺凌甚至吞灭。夫差之前,其父阖闾便

养精蓄锐,富民强兵,与周边楚、越等国针锋相对,但阖闾不幸战死沙场,夫差继位后承父未竟之愿,欲展雄风。吴国地处水乡泽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舟船水师是其军队优势所在。为便于军队和军需直达要地,夫差开凿了由大江通达淮水的邗沟。前485年,他挥师北上,伐齐攻晋,逼齐晋签下盟约,成为霸主。很显然,谋求国家这一主体的生存空间是吴国夫差开邗沟的最原始动因。

求生而促使运河生,乃是运河之要。纵观运河的变迁史,虽然就其成因及初始功能而言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但本质上运河的通变莫不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密切关联。在某种意义上看,运河就如同人之动脉关涉到生命躯体的存亡,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隋炀帝开隋唐大运河贯通中国南北之前,不少帝王认识到渠道的沟通对于国家的存亡具有的特殊意义,典型的如秦始皇,在七国争霸剧烈之时,他曾洞察到韩国暗使水工郑国往秦开渠是图谋加害秦国,本已宣判郑国死刑,但郑国进言:“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始皇悟出其道,“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阨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sup>[4]</sup>从而“为秦建万代之功”<sup>[5]</sup>,秦始皇感佩有加,于是将此渠命名为“郑国渠”,足见他对该渠对秦王朝的价值高度认同。另有一代枭雄曹操,同样也意识到沟渠之通的战略意义和民生价值,汉末因长年战乱,军需给养紧缺,而且民生极其困厄,诸多原本繁华之地却“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sup>[6]</sup>,曹操为了实现统一大业,相继开挖了白沟、平虏渠、利漕渠、泉州渠,这一方面为讨伐袁绍家族势力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为平定北方部族骚扰奠定基础,所以,“曹操统一北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胜利,与他开挖运河有着直接的关系。”<sup>[7]</sup>即使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也意识到开通河道的必要性,如北魏孝文帝就曾对大臣李冲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魏书·李冲传》)可见,谋运河之道,实质是在谋一国之生机。

隋炀帝是贯通南北大运河的第一人,他开通济渠和永济渠而与江南运河沟通,实现了使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中心无障碍对接的宏愿。其实,隋炀帝这一愿望的实现其功绩有大半应算在其父隋文帝的头上。隋文帝杨坚不仅为隋朝开国立基,他更认识到漕运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他看到“京邑所居，入于渭川，重关四塞，水陆艰难”，于是下令宇文恺开漕渠，“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sup>[8]</sup>而且在漕渠功成之时，隋文帝还“幸灊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另外，他在开皇七年“於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sup>[9]</sup>。通过漕粮北运，以缓解关中连年大旱，百姓饥馑的困境。由此可见，运河的开凿在隋文帝的视野中，不只是关涉到国之大计，也直接与民之生计休戚相关。为此也成就了一个“人庶殷繁，帑藏充实”“国计之富者莫如隋”<sup>[10]</sup>的时代。不过，最为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巨富的时代只经过了短短的两代人就断送在隋炀帝的手上。问题似乎也与运河有关。隋炀帝基于保障京都供给，也考虑更有利于消弥边患、巩固疆土，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动用数百万劳役先开凿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年），而后又在黄河以北开永济渠（608年），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四千万的情况下，征劳役兵役却达三千万人次。隋炀帝贪开河兴业之功，却无视民生之需，不顾百姓疾苦，结果引发民怨沸腾，揭竿而起，以至政权崩溃，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说隋速亡在开河当然不妥，根本的原因还是隋炀帝个人好大喜功、骄横狂妄，不顾民生才遭此结果。因而，只有“生生”之合方能延续世代伟业。

正是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唐代的中兴在几代人的传承之间都围绕国计民生展开，而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谓“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故尽脂膏是此河！”（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恰是运河对盛唐时代来临产生巨大影响的生动写照。正因为如此，自唐高祖至唐玄宗几代帝王对运河皆在兹念兹，视运河为国之血脉，特别是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几代，三番五次行幸东都洛阳，实则都是为了巩固王权确保漕运的顺畅躬身力行之举。如唐高宗在咸亨初年行幸洛阳时曾说：“自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雒口仓廩且复充实，更为转运，于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sup>[11]</sup>唐玄宗前往洛阳时更为直白，他说：“卜洛万方之隩，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沟通江汉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sup>[12]</sup>他们之所以行幸东都洛阳，不仅是关心洛阳的仓廩充实，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洛阳可保证资源的充足。所以，在“安史之乱”前，重开关中漕渠，整治汴河，开三门水道，整修山阳渎，疏理永济

渠，修治江南运河等重大工程相继展开，为保证向京城提供丰裕的物产创造了条件。相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对运河水道治理漠不关心，有的藩镇甚至为达到军事目的还蓄意阻断水道，控制漕运线路，运河交通多有淤塞，唐帝国也渐呈衰颓之势。到唐僖宗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sup>[13]</sup>这意味着当运河这条“生路”被废，帝国盛世便风雨飘摇，末日将至。

由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可见对运河“生路”的调控是一个关节点，这也难怪在随后的五代十国纷乱期，后周的周世宗清醒意识到必须疏通因战乱而荒废的运道，他力排众议，要求疏浚河道“东至泗上”，认为如此“数年之后，必获其利”，在他主导下，汴河、五丈河、蔡河得以疏通，从而“使舟楫可达江淮”<sup>[14]</sup>。只是周世宗并没得其利，反倒是为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的江山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宋太祖立国之时，他把运河通漕最为便利的中心——汴京作为国都，这表明宋太祖及众臣极为明了国之生息仰仗此河，大臣张方平在《论汴河》中说道：“国依兵而力，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sup>[15]</sup>《宋史》则记载有宋太宗心系运河的故事，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水决浚儀县（河南开封内），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驾，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遂捧辇出泥淖中。诏兴督兵卒数千塞之。日未吁，水势遂定。帝始就次太官进膳。可见，太宗对此河的重视程度。

运河的生息之津、通变之要固然与自然环境的变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水系的发达、地势的高低、雨量的多寡、土质的松紧等都关乎运河的生成与通畅。古代战事频繁，运河多有荒废淤塞之时，但古人总能在求变中使运河获得重生，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自隋贯通南北大运河之后，运河在元代再次发生巨变。截弯取直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京杭大运河的策略，但内在的根由是忽必烈为了蒙元帝国的大一统格局所制定的国之大计。虽说忽必烈来自蒙古草

原,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南征北战一统江山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然而在立国守成再创帝国盛世的问题上他也是高屋见瓴,而非率性而为。其时“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怎么办?忽必烈深知要维护国家永久之利,漕渠通达是关键。于是,在他一统天下之后,开坝河,凿通惠河,治南北运河,又开济州河、会通河,整治江淮运河,确立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的雏型。可以说,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的结构性、方向性乃至战略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其奔涌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与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有重大关系。以大运河为轴构成了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程的城市群,由此发散开去,无论是国内的东西南北还是境外的西路海域,都可以发现通过运河传递出去的印迹和气息,因为大运河链接的不仅是中华南北,而且还是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傅崇兰先生在《运河史话》中说:“明代和清代北京的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在明清两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会馆,都打着南北大运河的印记。晨钟暮鼓与航运相伴,各处的桥梁于运河相依,‘南河沿儿’‘骑河楼’‘银闸儿’,还依稀可见河道踪迹、缎、瓷、灯、竹等都印记着运河的来历;海运仓、北新仓、北门仓、南门仓、东门仓、禄米仓第与通州仓有着直接的联系,又好像是出运河里流来的金和银。”<sup>[16]</sup>在江南,商业性的棉花和棉布生产以及丝织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宋至明清时期经济社会的支柱产业,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便利的交通为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否则,运路不畅,则营销无道,要形成规模化生产也是奢谈,如此,陆海丝路也就成无本之木。

明清两朝,但凡有识之君皆深谙此河与国家生计息息相关的道理,费尽心思保证运河的贯通。两朝皆以治黄保运作为重大国策,采取各种办法解运河淤堵或堤决的问题。如潘季驯的“束水攻沙”<sup>①</sup>,靳辅的“黄淮相济”<sup>②</sup>,陈潢的“放淤固堤”<sup>③</sup>等等,都为百姓免遭水患、漕运顺畅做出了贡献。在康乾盛世,康熙和乾隆各自六下江南,都把视察河工视为第一要务。康熙认为“淮、扬等处堤岸溃决,淹没田地,关系运道民生,甚为重大”,因此,他顺运河南下

巡视必察河工,甚至还亲自制定过具体的治河方案。(《清圣祖实录》卷229)乾隆亦然,他在晚年曾说:“六巡江浙,计民生之重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补偏救弊因时制宜之方,亦既殚精劳思,夙夜讲求,……兹幸南北河工,开放新河之后,化险为平……”。<sup>[17]</sup>运河通则寝食安,家国天下方得太平。

综上所述,运河之生,表象为漕,实质为生,所谓“漕运线就是生命线”的理解体现了大运河的基本生成理路。因“生”而“生”,构成了大运河在两千五百年时空转换中“生生不息”的动因,使之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血脉。

### 三、大运河“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

历史是复杂的,大运河的变迁同样是复杂的。在广袤的大地上开凿一条史无前例的、长达几千公里的人工运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看待运河,无不赞叹它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实际上,大运河的开凿从一开始就与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相伴,它并不是行进在一帆风顺的大道上,而是交织着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因素,有时它所带来的可能并不完全是福音,还有可能是灾祸。如隋炀帝开凿运河强征劳力对当时的百姓而言是极大伤害;又如明清时期发生的黄河夺淮引起的灾害与运河的淤积存在一定的关联。然而,如果因为运河曾经有过缺损致灾就否认其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是有失客观公允的。纵观大运河漫长历史变迁过程,运河的主流是与古代中国社会进步血脉相融。

前文已述运河在历代王朝国之大计中的地位,这同时还可以看出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仅如此,运河的出现所改变的更是中国的自然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和走向,因“运”而“生”所表达的是客观事实。运河有满足国家战略需要的原生性,也有着因为运河的沟通而呈现的衍生性。

首先,运河带来的区域空间状态的衍生,以江南为例,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过西汉时期的江南风貌,“江南卑湿,……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以故沓廛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sup>[18]</sup>可谓是一派萧瑟荒芜之象。而随着运河的

① 束水攻沙:明代总理河道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他主张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改变了过去治理黄河与运河的做法,成效显著。

② 黄淮相济:清代河道总督靳辅的主张,让部分黄河水经过低洼地沉淀泥沙变成清水,然后注入洪泽湖以增加冲刷清口泥沙的能力。

③ 放淤固堤:靳辅的幕僚陈潢的治河策略,就是在河堤不牢固地段,建设涵洞,引黄灌注,使清水流在月堤外,堤内淤成平陆与黄河水面几乎齐平,如此不仅堤基牢固,而且每年取土保护堤岸也更为方便简单。

逐渐开发,特别是到隋朝时,“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听聚,故商贾并凑”,<sup>[19]</sup>这才保证了隋朝的“衣食兹殖,府库盈溢”。自隋唐始,江南的空间意象豁然洞开,清丽的自然、肥沃的土地、繁华的市井、富庶的家园……,吸引了无数官吏士绅、平民百姓纷纷朝向“东南飞”,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信息与交通要道就是大运河。所以说,大运河的通达为古代中国拓展了一个极具魅力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地理环境意义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价值上,江南都呈现出了超越先秦时代的独特景观。

其次,运河一脉滋润中华文化的衍生。运河的融通对于中华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水乳交融具有催化的作用。因为运河的通达,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大运河也为技术(农耕技术、水工技术、造船技术、建筑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等)的创新与推广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sup>[1]</sup>。儒佛道的源起与传播,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流布,水韵书香、笔墨丹青,深深地印上了运河的痕迹。仅以儒学传承为例,孔子为儒学开宗,始于属运河区域的山东曲阜,其后他率一众弟子周游列国,不外乎是鲁、宋、齐、卫等诸侯小国,它们与运河有源流关系。孔子之后的孟子与荀子也大都生活在运河流域周边的范围,各自阐发儒学要义。汉代儒学复兴自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始,他生于河北衡水,曾在德州治学,皆与运河有关。唐代大儒韩愈、李翱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以隋唐运河的中心——洛阳为轴展开,而宋代二程的洛学及其道南传也是沿运河一线。元代尚儒是以大都为核心,而这正是京杭运河的始点,到明清时期,无论是阳明心学还是其后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也可以在运河的空间范围溯源寻流。而与儒学传承相伴的科举应试及书院设置恰恰在运河流域最为发达。<sup>[20]</sup>

再次,运河之轴推动了商贸与文化交流的衍生。有道乃生,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通道是大运河,唐代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中外交流最繁茂的时代,与运河的通达便利密不可分,欧罗巴、日本、阿拉伯帝国、波斯、新罗、天竺等地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人等往来络绎不绝,开放的大运河书写了中外交流史上的辉煌。至于通过运河而衍生的城市则无需赘述,通州、天津、开封、临清等都是因河而生,即便是北京、也是“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所以,当代对运河文化精神的凝练不是单纯趋于运河所具有的某方面价值的思考,而是基于对运河宏大的历史叙事意义所做的总结。“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精神表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客观存在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内在蕴含的与中华文化一致的精神逻辑。道法自然的智慧,百折不挠的斗志,创新包容的气度,汇通天下的理想聚合成了大运河“生生不息”的恒久根脉。

第一,道法自然的智慧。道与自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本根,依此理水治水是古人的出发点,《管子》早就提出理水应“因其利而往之可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sup>[21]</sup>,《文子·道原》也说:“古之渎水,因水之流也”<sup>[22]</sup>,表明先贤的理水智慧是遵自然之道展开。运河是古代中国的国之大道,非顺势而为难以成功。象天法地,依自然之道,运河最终成为沟通五大水系的国之命脉。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运河开凿和整治的不同时期都有充分体现。如古鸿沟开凿形成的水系范围就覆盖了荥阳之东、泗水之西、淮水之北、济水之南的广大地区,极大便利了水运交通;又如隋炀帝开通济渠则利用了黄淮平原南半部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特点,将谷水、洛水、黄河水导向淮水,沟通了京都通往江淮之路;再如明代在山东南旺建设的水利枢纽工程,就是朝廷大臣宋礼采纳民间理水专家白英的一系列建议,借水行舟,兴建“水柜”,因势利导,引泉补运,确保了运河长年畅通。这是顺应自然以成就运河功用的典范,以致清帝乾隆也赞叹其“天然因地利,神威借人工。”(乾隆《题分水龙王庙》六)。

第二,百折不挠的斗志。传说大禹治水,前仆后继,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力,终获成功。中国大运河并不是一蹴而就、一通百通的,从古邗沟、浙东运河到隋唐大运河再到京杭大运河,乃至当代统称的中国大运河,两千五百年的历程,开凿与整治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遭遇了难于估量的艰难困苦,也包含了无数的血泪辛酸,但至今能生生不息、一脉长流,正是在世代存亡接续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斗志的结果。淤塞、溃堤引发的灾难并没有导致运河的销声匿迹,而是更激发出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疏导运河畅通的勇气。明清时期,因长期战乱及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黄河泛滥改道常致运河区域屡生灾害,康乾两朝,不仅帝王对治黄保运矢志不渝,认定“百姓尽安畎亩之日,方是河工告成之时”(康熙),亲力亲为巡视河道,而且朝中臣民如靳辅、陈潢等也是为治河竭尽

心力,十余年坚持不懈。康熙在评价靳辅时说:“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清史列传》卷8靳辅传)王士禛也在为靳辅撰《墓志铭》时写道:“论其大者,而功名尤其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国家,其德泽在生民。”<sup>[23]</sup>以百折不挠的斗志在复杂曲折的过程中与困难、挫折与打击抗争,是中华民族巍然矗立的基石所在。

第三,通变创新的气度。大运河是在通变中走过两千五百年,一代代人在革故鼎新、审时度势寻求探索创新运河价值的契机,从春秋时期肇始之后运河能在通变中活力再现的动因就在创新。纵观其变,至少在下述几方面可见其创新的价值,其一,河道在求变中延伸。夫差开邗沟通江淮,隋炀帝开通济渠和永济渠连接南北,郭守敬截弯取直构建京杭大运河的雏型,每一阶段的工程启动都意味着运河的一次革新,以致影响到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心的转向(由东西逐渐向西北——东南再向南北偏移)。其二,运河功能在流变中拓展。早期的运河更多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如夫差开邗沟、秦始皇开灵渠等皆服务于军事目的,但后来运河的便利通达使漕运成为主导性功能,同时又因不同区域的特点,灌溉、泄洪、排涝等功能也得到开发和利用。其三,运河治理和管理方略在通变中调整进步。复杂多变的大河道治理和水运管理始终具有挑战性,而在不同时期的治理者能积极探寻应对策略,如唐代裴耀卿、刘晏的漕运改革之道,前述郭守敬、宋礼、潘季驯、靳辅等人的治河之道,都在面对挑战创新求变使运河发挥出极大的价值。

第四,汇通天下的理想。“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易经·泰卦》,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古人理解世界的素朴方式是“大道之源”,臻于“大同”的理想状态必有天地、上下之交。开凿运河的实践逐步实现了因“交”而“通”达“同”的理想,特别是在隋唐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开凿完成南北互通的壮举后,实际上促成了古代中国水运交通网状格局的形成,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由运河之“纲”而得以联通。由此通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等等互相接触、混杂、联结、融合,尽管其中也有矛盾、对立、冲突,但大运河终究为建立、维护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绵延至今、也为人类文明的互融互通贡献了独特的价值。

#### 四、大运河“生生不息”的时代交响

自从清末光绪年间(1901)宣告废止漕运,运河的境遇日趋清冷,鲜有问津,有意思的是,清王朝在

运河被堵、漕运被废的不长时间里(10年)就被推翻,重蹈了唐宋元明皆出现过的河断国亡的覆辙。此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运河的命运也是在苦难中走向衰萎。虽然其时偶因灾害促使当权者进行小规模河道整治,但运河的南北通达却没能再现,运河两岸曾有的繁华日渐式微,变得寥落沉寂。即便如此,运河在局部地区依然默默地发挥它特有的功能,为水利、民生、商贸、运输等担当应有的使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大运河才得迎来再次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已近七十周年,我们可以把大运河的新生分为三个时期,这在运河史上谱写新的篇章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后到21世纪初,这是对大运河实体河道的修复、整治和扩展时期。建国初期,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鉴于黄河以北的运河河道要么淤塞,要么缺水断流难以恢复的状况,修复整治运河实际上是以江浙两省为重点展开,尤其是以江苏为突破口。其时,在江苏苏北开挖了灌溉总渠,培修运河大堤,兴建三河闸和淮安、皂河的水利枢纽;在苏南开挖过苏州的两条新航道,同时在江苏境内的主要运河航道上设置了航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杭运河江苏段持续得到整治和维护,疏浚拓宽河道、设置船闸、提高航道等级是主要建设方向,如苏北段第一期工程建设,是按二级航道标准进行治理,竣工后提高了水运能力近20倍。改革开放后,京杭运河徐(州)扬(州)段续建工程启动,这是建国后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内河建设工程,涉及河道、补水、船闸、桥梁等八大类项目,按二级航道标准建设,到1988年,续建工程宣告完成。而后苏南运河全面整治工程启动,到1997年工程完工,苏南运河成为一条集标准化与美化于一体的样板性示范性航道。在此期间,浙江也对境内航道进行了全面改造,特别是三堡一线船闸建成通航,京杭运河与钱塘江沟通顺利实现,从而使运河的航运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运河成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水运交通、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壮大、产业集聚、旅游业的兴旺以及防洪防涝、供水灌溉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注入了“运河活力”。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倡议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到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大运河以文化形态彰显其非凡价值并得以重生的

确立时期。十年申遗路,是把大运河重新纳入世界文明视野的十年。在运河的实用功能逐渐被迅速发展的公路、铁路、航空、海运所替代时,大运河不仅日渐淡出公众的视野,甚至也远离人们的记忆。运河申遗工程的启动,为大运河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开辟了新路。在艰辛的申遗过程,集聚了无数有志中华文化复兴的人民流下的辛劳汗水,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申遗之路。流动的运河是“活态的遗产”,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审报告中认为,从历史深处流出的“大运河”,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24]</sup>申遗成功,预示着大运河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这不仅在地理空间意义上证明了运河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与贡献,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大运河在其演进之路上迈入了新的轨道——一条积淀深厚的“文化长河”由此诞生。

第三阶段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全面推进时期。2017年,习总书记关于“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指示和“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的思想是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与时代抒写交响合奏的总纲与指南,这昭示着大运河将因其历史的伟业而焕发青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旨在凸显中华文明的底气,彰显民族创新的志气。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大运河贯通南北,联通古今,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合理利用文化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sup>[25]</sup>由此可见,大运河再次成为国家大计亦已超越了它以往的实用性功能,其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价值是使其活力涌起的源泉。

大运河汇集交通之用、生态之养、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规划纲要》提出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继古开今的璀璨文化带、山水秀丽的绿色生态带、享誉中外的缤纷旅游带,把“魅力运河”“美丽运河”“多彩运河”呈现给世界,确立了新时代抒写运河宏

伟篇章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具体设计出“一轴三带五片区六高地”多点联动的方案,以运河为轴,策动多翼齐飞。并且坚定“坚持以文化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sup>[25]</sup>的原则,科学规划中长期建设方向,切实保证大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千年运河”为民生福祉、文化自信、国家兴盛贡献新生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它展示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服务于当代人民的幸福追求,是当代人谱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地史诗。生生不息的大运河,金帆犹在,川流不息!

## [参 考 文 献]

- [1] 言省.“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N]. 中国文化报,2012-10-18.
- [2] 连冬花.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 [3] 王健.大运河的精神品格和时代价值[J]. 群众,2018,(2).
- [4]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班固.汉书·沟洫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范曄.后汉书·仲长统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册[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93.
- [8] 魏徵,等.《隋书》志第十九食货[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9] 魏徵,等.《隋书》卷1高祖纪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73:25.
-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董浩,等.《全唐文》卷一四赐京城父老勅[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幸东都诏[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720.
- [14]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5]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七汴河利害事[M]. 古本,刊印者不明,1968.
- [16] 傅崇兰.运河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 [17] 乾隆.万寿重宁寺碑记[M]//重修扬州府志卷三. 扬州:广陵书社,2006.
- [18]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 魏徵,等.隋书·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0] 谢光前.儒学在运河流域的源起与传播[J]. 珠海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85-97.

[21] 管仲. 管子[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2] 佚名编. 文子[M]. 北京:中国书店,2018.

[23] 王士禛. 靳辅墓志铭[M]//碑传集卷 75.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 记者. 丝绸之路、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N]. 科技日报,2014-06-23.

[2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Z]. 2019-02-01.

(责任编辑:闫卫平)

## Re-discussing that “endless life” is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anal culture

XIE Guang-qi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is surgi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anal on China's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past 2500 years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ts practical func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imes to condense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al Culture accumulated in the long stream of time and the grand series of spac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Canal have witnessed twists and turns, hardships,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the long process, but they still stand in the East. The form of civilization is still shining brightly and vigorous in the journey towards the future, which embodies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endless life”. The Grand Canal bea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connec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of ancient China. After several blockages, it can regenerate indefatigably. It not only achieved the glory of the flourishing ages of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multiplied and nourished countless cultural treasures that can be proud of. The endless spirit contains the wisdom of Taoism and law, the indomitable spirit of struggl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tolerance, and the ideal of converging the world.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Grand Canal, as a world heritage and a symbol of human civilization, still has golden sails and a continuous stream of water. The Millennium Canal will contribute new forces to the well-being of people's livelihoo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Key words:** Endless life; The Grand Cana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undamental Spirit